

# 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 及网络规制的调节作用 ——基于大陆九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研究

卢家银

## 摘要

在回顾互联网对公民政治参与影响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大陆境内九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N=1471),系统分析了当前风靡社会的社交媒体对当代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与互联网的负向作用不同,社交媒体不仅推动了青年群体的线上政治参与,而且促进了青年人群的线下政治参与。并且,互联网规制对青年的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具有限制作用。其中,网络规制虽未能有效减弱社交媒体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但是它却削弱了社交媒体对青年线下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

## 关键词

社交媒体、网络规制、政治参与、媒介治理

## 作者简介

卢家银,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电邮:medialaw@qq.com。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交媒体对当代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与引导机制研究”(项目编号为:14CXW032)的阶段性成果。

##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Young Adul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Moderation Effects of Internet Regulation: A Survey on Students from Nine Universities in China

LU Jiayin

##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ing the impact of Internet on the peopl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is paper conducted an online surve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N=1471) and examined whether social media affected young adul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what role Internet censorship plays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acilitated by social media.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media promotes young adults' online as well as off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hich different with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Internet. And Internet regulation had a negative effect on youth's online as well as off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Governmental regulation not weaken the positive impact which social media on youth'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 them, but moderated the positive impact which social media on young people's off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Keywords

Social media, Internet regul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edia governance

### Author

Lu Jiayi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Email: medialaw@qq.com. This paper was fund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 titled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youth'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No.:14CXW032).

##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年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和移动设备参与政治活动的频度日益提高,在当下青年群体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交媒体获取政治信息、自主制作时政内容和表达政治观点(Yamamoto, Kushin & Dalisay, 2015)。在美国,特朗普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成功运用社交媒体制造新闻、吸引选民并赢得选举;在中国,青年网民在微信、微博中讨论、分享劳教制度的废除和反腐风暴中落马的官员,积极参与基层反腐和公共决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的年龄结构呈现出年轻化的特征,在7.72亿网民中10-39岁年龄段成为主要群体,比例达到73.0%,其中20-29岁年龄段网民的比例为30.0%,在整体网民中的占比最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8)。《2016年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亦显示:80后和90后的群体占社交媒体用户总体的65.7%(徐凌蓓,2016)。在社交媒体的各类功能使用中,新闻资讯的使用占据主导地位,80.3%的新浪微博用户通过新闻微博关注新闻及热点信息,41.5%的微信用户关注媒体类账号,13.9%的网民通过社交网站关注热点新闻(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4)。许多青年用户都会关注政治资讯、分享时事新闻、收看政治视频和批评环保政策。

对于社交媒体的政治影响,国内外现已陆续出现了一系列的论著,分析了社交媒体对政治选举、社会运动、民主决策和利益表达等问题的不同影响(Campbell & Kwak, 2010; Vitak, et al., 2011)。但是,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是正面、负面还是差异化混合影响并未得到经验性分析和验证(Gil de Zúñiga, et al., 2010; Campbell & Kwak, 2010),特别在中国,由于媒介管理体制的不同,社交

媒体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还有可能受到关键字屏蔽、网络实名制、网络删帖等政府网络规制措施的调节。在这种情况下,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是促进了青年的政治参与、还是导致青年沉溺于娱乐活动而限制政治参与?这需要我们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为了探讨社交媒体的这种影响,本研究对中国大陆四个城市的在校大学生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尝试解析社交媒体对我国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网络规制在这种影响中的作用。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一) 概念界定

政治参与既是现代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根基,又是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所谓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指公民试图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决策和行动的各类活动(Verba, Schlozman & Brady, 1995: 38)。它“不仅包括行动者本人自发的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而且包括行动者受他人策动而发生的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亨廷顿,纳尔逊,1989/1976: 7)。根据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制度框架,政治参与可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前者是公民在现有的制度范围内进行的政治参与,而后者是公民“突破现存制度规范的政治参与行为,也是社会正常参与渠道之外发生的活动”(方江山,2000: 38)。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包括基层选举、通过人大政协议政参政、信访、行政诉讼、参加听证会和咨询会等。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则包括越级上访、集体罢工、暴力对抗、围攻基层政府、个人自戕与私人报复等,例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我国香港的占中游行。相较于制度化政治参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对参与者和政治决策者的压力和冲击均比较大。

在现代社会,媒体、政党、工会和各类社会组织等均能为民众提供政治参与的渠道与机会。伴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特别是新兴的社交媒体(在国外主要以Facebook和Twitter为代表,在国内主要以微信、微博和QQ等为代表)已经成为公众政治参与的全新重要平台。互联网及其新应用为多元海量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降低了信息传播、公民集会和参与的成本,既扩大了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又拓展了非制度化参与的平台,从总体上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Weber, Loumakis & Bergman, 2003)。根据互联网的特性,网络时代的政治参与又被分为虚拟的线上政治参与和真实的线下政治参与两类(Gil de Zúñiga, 2012)。线上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访问政府网站、浏览时政信息、发布或转发时事信息、批评与抗

议政府决策、在线投诉或抗议等，线下政治参与则包括出席听证会、联系政府官员、为党政机构工作、参加游行集会和参与政治选举等。在当下，线上政治参与已经成为公民意见表达、利益综合和参政议政的重要方式，直接影响和冲击着公共决策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 （二）社交媒体与青年政治参与

在对互联网政治影响效果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界对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特别是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展开了广泛研究。现有关于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参与影响效果的研究既有乐观主义的正效果发现，又有怀疑主义的负效果主张，还有烛照两者的情境决定论。

首先，持正效果论者认为，社交媒体超越了传统媒体的局限，实现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交融，在“真实社会化”和“虚拟社会化”合而为一的过程中，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兴趣、机会、成本和程度都得到较大提升。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广大青年能够与同侪迅速、及时地建立社交联系，并进行时事信息、政治见解的即时互动。用户在这种互动过程中，既消费自生的博客内容、用户评论和其他人上传的视频、音频和图片等各类资讯，也获取来自传统媒体的时政内容和消费化的政治信息流（Yamamoto, Kushin & Dalisay, 2015）。其中，用户自己制作的这些“原始”政治内容和评论常常包含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信息和视角（Carpenter, 2010）。韦路和李锦容（2012）指出：社交媒体中的传播与互动几乎没有什么成本，使用方法极为便利，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青少年的参与热情，使广大青少年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大提升。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不仅改变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模式，而且使青年的政治参与方式从传统的社会动员转变为个体自发参与。社交媒体出现以后，微博、社交网站、即时通讯工具等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的信息不对称，为广大青年和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创建了便捷、互动的参与平台。社交媒体之中的“关注”“粉丝”“好友”“转发”和“群组”等，都是基于共同的兴趣、利益或意识形态的而形成的新型参与结构，这种结构与青少年的社会交往和同辈群体的日常交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利益表达和聚合更加自由（卢家银，2012）。尤其是在选举期间，社交媒体的使用可以促进政治参与行为。王泰俐在对2012年我国台湾大选中的社交媒体进行研究后发现，经常阅读网络选举新闻，就越有可能参加选举造势活动（王泰俐，2013）。借助于社交媒体，公民甚至不再受选举周期的限制，随时可以就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对具体的政策问题形成影响（马小娟，2011）。



在此基础上, 社交媒体为广大青年、特别是政治结构中相对边缘的人群, 提供了进行政治倡议、参与和动员的平台。社交媒体通过促进政治冷漠和参与渠道匮乏的人群进行在线的政治参与, 增加他们的政治话语权, 可以促进政治参与的平等, 它能够鼓励青年群体和更多的公民参与意见表达、社会治理与公共决策 (Savigny, 2002)。汤姆·波斯特麦斯 (Tom Postmes) 和苏珊娜·布朗斯汀 (Suzanne Brunsting) 指出, 社交媒体的出现, 对于在传统政治中相对缺乏资源的群体而言, 既给他们提供了突破传统媒体门槛、增加能见度的管道, 更能用于组织线下抗议活动 (Postmes & Brunsting, 2002)。皮帕·诺里斯 (Pippa Norris) 也认为, 互联网、特别是新兴的网络应用对虚拟民主具有巨大的潜能, 它能吸引以往不具代表性的个人参与到纵向传播和横向传播的新平台中来, 从而能够减少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不公 (Norris, 2000: 398)。在我国, 这不仅表现为通过社交媒体可以累积和集结公民和青年群体的力量, 形成集体动员的合力, 而且表现为普通青年群体和各类社会团体能够通过社交媒体等网络新应用突破传统主流媒体的报道限制, 从而达到互动沟通与动员维权的效果。邵国松和卢家银等人在对中国厦门的PX事件进行考察后发现, 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打破了信息不对称并创建了一个新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特权被削弱, 民众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 (Shao, Lu & Wu, 2012)。有学者还发现, 青年群体已经开始通过利用互联网及其新应用去巩固和加强他们的离线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参与, 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与深度 (吴世友, 余慧阳, 徐选国, 2013)。

其次, 持负效果论者则认为, 社交媒体只是映射、或强化了已有政治参与的不平等, 他们认为社交媒体等网络新应用对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影响较小、甚至具有削弱政治参与的负向作用。帕特南在研究互联网的政治影响时就持这样的批判观点, 他认为互联网对公民参与具有一种有害的影响, 因为这是一种主要用于娱乐的技术 (Putnam, 1995)。这种用于娱乐的技术会导致用户精力的分散, 民众只剩下很少的时间去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 例如参加公民团体、看望家人和朋友、参与政治投票等 (Kaufhold, Valenzuela & Gil De Zúñiga, 2010)。布鲁斯·哈迪 (Bruce Hardy) 和迪特拉姆·舒菲利 (Dietram A. Scheufele) (2005) 同样发现, 互联网上的不同信息使用对民主参与只产生了很小的影响。随着网络使用时间的增多, 网民参与政治的时间会减少、参与要求也会降低 (Delli Carpini, 2000)。2014年8月, 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 “从总体上看, 互联网削弱而不是提高了人们的政治参与度。社交媒体降低了人们表达意见的可能性, 尤其是当他们认为自己的看法与朋友不同的时候。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

体实际上压制了观点的多样性,而且抑制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讨论。”(Hampton & Rainie, 2014)对此,我国学者陈力丹等人(2015)也强调:“web2.0时代社交媒体的兴起,并没有按照很多人预期的那样提高公众的政治参与度,而是让人们的政治参与度下降了。”陈力丹(2015)认为,社交媒体在政治参与方面的作用总体势衰的原因在于,这类媒体并非以政治参与为目的,私人传播性质明显,社会政治动员能量很有限。有研究甚至由此指出,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现有的社会不公并扩大了政治参与群体和不参与者之间的参与鸿沟(Norris, 2000: 398)。

最后,情境决定论者认为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较为复杂,可能依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异。这种主张是早期互联网政治影响效果差异化观点的延续。对于互联网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社会学者西迪尼·沃巴(Sidney Verba)和凯伊·施洛茨曼(Kay Schlozman)(1995: 503)曾指出:政治参与行为的存在和出现可能是多种因素影响或诱导的结果,不能过度放大互联网的作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发现互联网对社会资本和政治参与的影响依个人使用的时间长度和使用动机而异(Shah, Rojas & Cho, 2009)。发展到社交媒体时代,不少学者发现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非常类似于传统的网络媒体。马修·酒辛奈(Matthew Kushin)等人(2010)发现,“仅仅是通过网络服务获取政治信息,并不能显著地提升政治参与度。相比之下,只有在社交网络上经常表达政治观点的青年群体,才越有可能较多地参与政治活动。”与之类似,张魏武(音译)(Weiwu Zhang)和托马斯·乔森(Thomas Johnson)等人(2010)提出,社交媒体只是和公共参与有正相关关系,而不是与政治参与有这种关联,人与人之间对政治话题的讨论才会影响青年的政治参与。同样,雪莱·宝利安尼(Shelley Boulianne)和迈克尔·谢诺斯(Michael Xenos)等人(2009)也指出:“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使用对政治参与并没有直接发挥强化动员的功能,只有在政治兴趣较高的群体中,线下政治信息的使用才能对传统政治参与产生比较集中的促进作用。”荷马·祖尼加(Homero Gil de Zúñiga)等人则发现,社交媒体中的不同内容使用会对青年的政治参与产生不同的影响:网络游戏和网络聊天室使用与政治参与是负相关关系;网络信息使用与政治参与是正相关关系(Gil de Zúñiga, Copeland & Bimber, 2014)。

尽管如此,许多学者仍然坚持认为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参与具有促进作用。马修·尼斯比特(Matthew Nisbet)和迪特拉姆·舒菲利(Dietram A. Scheufele)(2004)通过全面研究后得出结论:网络使用和政治参与有正相关关系,它较好地提升了青年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并促进社会运动。贾斯汀·巴塞克(Justine Pasek)

和大卫·罗默(David Romer)(2009)等人也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与线下政治参与呈正相关关系,但是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因使用人群和使用Facebook和Myspace而不同。塞巴斯蒂安·巴伦苏埃拉(Sebastián Valenzuela)等人(2009)虽然认为社交媒体使用与青年政治参与之间可能是低度相关的关系,但是仍表示大学生使用脸书与政治参与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依然存在,且强调不能因此断定社交媒体并非促进青年政治参与行为最有力的预测变量。同样,学者陈力丹(2015)尽管认为社交媒体使用减弱了公民的政治参与,但是却承认英国2011年街头骚乱中的社交媒体的无组织动员,与具体情境、使用者的青年人群的特性有关。他只是认为这种影响效果不能推及所有公民群体。并且,研究数据显示,青年人群是最渴望使用互联网进行交流的群体,因为他们从童年或少年时期开始的社会化就是在互联网的环境中进行的(Quintelier & Vissers, 2008)。在政治参与方面,青年人群是非常积极活跃的群体,他们通过网络活动,大胆颠覆传统文化,不断建构他们自己的在线文化(Coleman & Rowe, 2005: 2)。在青年人群中间已经呈现出一种普遍特征,那就是离线活动的参与也会复制到在线活动里面,线下政治参与有时甚至和线上政治参与相交融(吴世友,余慧阳,徐选国,2013)。因此,那些越多参与各种不同社会和政治事务的青年,也会越多地通过网络在线途径来加强他们的参与度(DiMaggio, Hargittai, Neuman & Robinson, 2001)。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做出研究假设1:

社交媒体使用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H1a)和线下政治参与(H1b)具有正面促进作用。

### (三) 互联网规制与青年政治参与

中国对互联网的管理较严,不仅有强大的防火墙和关键字过滤,而且有正面报道的要求和访问境外媒体网站的限制(King, Pan & Roberts, 2013)。从2012年以来,媒介管理部门又开始逐步在全国推行网络实名制,要求网络用户(特别是微博用户和微信公众号)的身份要与其真实姓名、工作(或学习)单位和身份证相对应统一,即前台自愿、后台实名。为了配合公安部打击网络谣言的专项行动,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出台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不仅将手机、微博、微信等各类媒介纳入媒介管理系统,而且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即可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4)。同时,网络删帖现象长期存在,媒介管理部门经常会要求全国各大网

站和论坛删除包含敏感内容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网帖（Farrell，2012）。中国大陆对互联网的管制现已经从内容监管发展为资本属性监管，已开始把控制点进一步从网络中心移向边缘、从网络服务商和网站移向终端用户和个人计算机，尝试以“重新集中化”治理“去中心化”（胡泳，2010）。

这种网络规制不仅压制了民众采取集体行动的意愿，而且使网民形成了不同程度的自我审查习惯，绝大多数网民都会迅速删除敏感性时政类网贴，尽量减少公共参与活动（King, Pan & Roberts, 2013）。出于免除责任的考量，新浪、搜狐、腾讯等大型门户网站均严格按照媒介管理部门强化管理的要求，配合各级宣传部门的媒介治理行动，自建内容审核队伍（例如微博小秘书、微信管家等），及时删除各类涉嫌违法违规的网贴。尽管这种规制举措没有直接导致互联网的迅速消亡和网络谣言的消失，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网络生态，导致质疑和批评政府、政策和官员的言论迅速减少（King, Pan & Roberts, 2013），尤其使仇官类谣言的数量比例和偏激程度显著下降（熊炎，2014）。并且，“现在难以区别各种移动媒体的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账号等推送的新闻、广告和其他内容是出于订户的个人特点，还是受到政治控制、经济利益驱动。这些潜在的原因都有可能导致群体中少数人的观点、兴趣被压制”（陈力丹，谭思宇，宋佳益，2015）。受此影响，青年群体参与线上和线下的时事讨论、批评腐败官员和抗议政府公共决策的频度和程度都有可能降低。基于此，本研究作出研究假设2：

网络规制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H2a）和线下政治参与（H2b）具有削弱作用。

自从互联网崛起以后，网民和政府之间就展开了规制与反规制的技术博弈。尽管说在人人都是“记者”的互联网时代很难将网络管理得如铁桶一般滴水不漏，但是世界上各个政府都有办法限制不受欢迎的信息在网上传播。彼得·洛伦茨（Peter Lorentzen）（2014）指出：“一方面在人人都能成为作者、编辑和出版者的今天，一个威权政体很难限制一则新闻的传播；另一方面，这种不完整的新闻控制很快能够和传统的媒介规制模式相融合，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传统的媒介管理模式也随之能够调整和发展，从而对公民的表达行为产生影响。”在中国，微博、微信、QQ等社交媒体的出现，为民众的言论表达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平台，但是同样受到现行媒介管理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制。并且，社交媒体出现以后，网络规制力度进一步加大。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从2014年至2015年相继出台“微信十条”（即《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帐号十条”（即《互联网用户帐号名称管理规定》）、“约谈十条”（即《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



定》)等治理新规,对帐号注册使用、时事新闻的发布和违规处罚等作出了详细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意识形态规制很可能会削弱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

此外,这种较为严厉的互联网规制举措不仅会减弱社交媒体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正向作用,而且也可能削弱社交媒体对青年线下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限制超越现有体制承受能力和冲击现行政治体系的非法行为和非理性参与。由于网络实名制、网络诽谤入刑的司法规制和网络删帖的存在,很可能会导致青年搜集、分享信息的机会减少,降低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热情,增加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参加游行集会和参与政治选举等活动的成本和风险,从而削弱他们的线下政治参与。互联网规制力度的这种加大,究竟是否会减弱社交媒体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本研究试图对它进行分析。基于这种背景,本研究作出下述研究假设:

假设3: 社交媒体使用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作用受网络规制的调节影响。

假设4: 社交媒体使用对青年线下政治参与的影响受网络规制的调节作用。

### 三、研究方法

#### (一) 数据收集与样本状况

本文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探索了社交媒体使用、互联网规制和青年政治参与之间的可能性关系。调查对象为中国境内的18-35岁的在校大学生(包括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调查问卷上传、发布于“调查派”网站(<http://www.diaochapai.net>)。本次调查范围覆盖了东中西部的四座城市、九所大学,采用的是非概率抽样的方法,按照地域、城市、学校、学院、专业、年级和班级的层级,在东部地区抽取了北京和上海,在中部抽取的是武汉,在西部抽取的是兰州。在北京的57所本科院校中,本调查抽取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北京工商大学;在上海的31所本科院校中,则抽取了上海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在武汉的28所本科院校中,抽取的是武汉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兰州的12所本科院校中,抽取的则是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教育部,2012)。在每所学校抽取三个学院,在每个学院的每个年级各随机抽取2个班,作为问卷发放对象。在问卷发放过程中,我们委托被抽样年级(或班级)的学生志愿者和访员通过电子邮件、QQ、微信和手机短信四种方式邀请所在班级的学生在网上填写问卷。从2014年6月20日开始发放问卷,共向4500人发出邀请。截止7月21日,共成功收回有效问卷1471



份。其中,在北京收回884份,在上海收回279份,在武汉收回108份,在兰州收回200份,调查问卷的成功回收率为32%。

在调查样本的1471人中,男性青年占43.2%,女性青年占56.7%;年龄分布范围在18至3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1.5岁;在读大学本科生占84.9%,在读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15.1%;中共党员和团员占93.3%,非党团员占6.6%;受访者自我报告家庭收入在当地平均水平的占59.2%,月收入平均在2千至5千、5千至1万之间的青年最多,分别占样本总体的30.0%、29.6%。在媒介使用排序中,微信高居第一( $M = 2.86$ ,  $SD = 2.02$ ),QQ使用排在第二位( $M = 3.72$ ,  $SD = 2.33$ ),大型门户网站( $M = 3.77$ ,  $SD = 1.79$ )和微博( $M = 3.79$ ,  $SD = 2.15$ )分别居于第三和第四位。

## (二) 变量测量

### 1. 因变量

本研究基于荷马·祖尼加(Homero Gil de Zúñiga)(2012)和约翰·奥茨曼(Johan Östman)(2012)对政治参与的研究和分类,将因变量分为线上政治参与和线下政治参与。

#### 线上政治参与

本文依据祖尼加(2012)和奥茨曼(2012)对线上政治参与的测量,用12个项目测量线上政治参与。受访者要在李克特五级量表(1=从不,5=频繁)中填写他们过去一年中参加下列活动的频率:访问各级政府官网;访问公共管理部门网站;访问有政治内容的网站(即点击或浏览涉及官员、政党、上访、律师、警察、城管和维权人士等方面的信息、段子、图片或视频);对上述内容进行回复与评论;转发或发表有关上述内容的文章或帖子;参与各类网络签名活动;参与网络调查活动;在网上对政府的某项决策或行为表示抗议;在网上号召或实际抵制某种产品;因某事而在线联系某个政府部门;给某个单位领导发电子邮件;与朋友或同学在线讨论政治或时事类话题。这12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赋值( $M = 22.12$ ,  $SD = 8.15$ ,  $\alpha = .92$ )。青年群体线上政治参与的类型与频度分布情况可参照表1。

表1 青年群体线上政治参与类型与频度分布表

参与类型	从不 (%)	偶尔 (%)	较少 (%)	经常 (%)	频繁 (%)
访问各级政府官网	46.8	26.9	22.4	3.0	0.9
访问公共管理部门网站	40.4	31.4	23.7	3.7	0.8

访问有政治内容的网站	25.7	32.6	28.9	11.2	1.6
对上述内容进行回复与评论	49.6	23.3	22.8	3.5	0.8
转发或发表有关上述内容的文章或帖子	47.2	24.8	23.3	3.9	0.8
参与各类网络签名活动	62.1	16.3	19.7	1.8	0.1
参与网络调查活动	26.5	39.4	27.3	6.1	0.7
在网上对政府的某项决策或行为表示抗议	57.1	20.2	20.5	2.1	0.1
在网上号召或实际抵制某种产品	61.3	17.5	18.6	2.1	0.5
因某事而在线联系某个政府部门	61.1	17.8	18.5	2.5	0.1
给某个单位领导发电子邮件	71.3	11.9	15.0	1.6	0.2
与朋友或同学在线讨论时政话题	29.8	34.2	27.8	9.3	1.9

### 线下政治参与

本文使用荷马·祖尼加（Homero Gil de Zúñiga）、布鲁斯·哈迪（Bruce Hardy）和迪特拉姆·舒菲利（Dietram A. Scheufele）的线下政治参与量表，用13个项目测量线下政治参与（Hardy & Scheufele, 2005）。受访者要在李克特五级量表（1=从不，5=频繁）中填写他们过去一年中参加下列活动的频率：检索涉及政治或时事问题的信息与书籍；在两会期间阅读报纸、观看电视或上网看相关新闻；与同学或朋友在课堂或讲座中讨论政治或时事类话题；为某事联系某单位领导或某政府部门（包括居委会、村委会、街道办、乡镇或省市县等政府部门）；在党政部门或各类协会工作（包括在学校各类学生组织工作）；校内外的签名活动；合法的集会、游行活动；中国梦的宣传活动；抵制某种产品；由于政治、民族或环境因素而有意购买某种产品；向社会组织或公益组织捐款捐物；为非政府组织工作或担任志愿者；用写信或打电话等方式投诉、反映或是抗议政府某部门的某项决策。这13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线下政治参与的赋值（ $M = 26.38$ ， $SD = 8.61$ ， $\alpha = .89$ ）。青年群体线下政治参与类型与频度分布情况可参照表2。

**表2 青年群体线下政治参与类型与频度分布表**

参与类型	从不 (%)	偶尔 (%)	较少 (%)	经常 (%)	频繁 (%)
检索涉及政治或时事问题的信息与书籍	30.1	35.5	24.1	9.2	1.1

在两会期间阅读报纸、观看电视或上网看相关新闻	17.5	34.0	26.2	19.2	3.1
在课堂或讲座中讨时政话题	18.4	37.4	28.4	14.1	1.7
为某事联系某单位领导或某政府部门	48.1	25.6	21.7	3.9	0.7
在党政部门或各类协会工作	36.2	24.7	22.5	11.9	4.7
参加过校内外的签名活动	51.8	25.1	19.6	2.9	0.6
参加过合法的集会、游行活动	69.3	14.1	14.6	1.5	0.5
参加过中国梦的宣传活动	43.9	25.9	20.0	8.2	2.0
抵制某种产品	53.9	24.6	17.8	2.9	0.8
由于政治等因素而有意购买某种产品	49.7	25.4	20.1	4.2	0.6
向社会组织或公益组织捐款捐物	16.7	33.9	31.6	15.7	2.1
为非政府组织工作或担任志愿者	26.5	31.9	25.6	13.1	52.9
投诉、反映或是抗议政府某部门的某项决策	67.8	14.1	15.6	1.9	0.6

## 2. 自变量

鉴于社交媒体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一种网络新应用,且为了与网络使用进行对照,本研究的自变量中加入一般互联网使用,并与社交媒体与网络规制作为一个变量模块。

一般的互联网使用。对一般的互联网使用,本文依据汤姆·贝克(Tom P. Bakker)和克莱斯·德弗雷斯(Claes de Vreese)的互联网量表进行测量,主要通过两个问题以测定其使用时长(Bakker & Vreese, 2011)。受访者要分别在一个李克特十级量表(1=0-15分钟,2=15-30分钟,3=半小时-1小时,4=1-1.5小时,5=1.5-2小时,6=2-2.5小时,7=2.5-3小时,8=3-3.5小时,9=3.5-4小时,10=4小时以上)和李克特八级量表(从0到7天)中填写其使用时长:(1)您昨天使用互联网(不包括微信、微博和QQ使用)多长时间?(2)您上周有多少天使用了互联网(不包括微信、微博和QQ使用)?这两个项目的乘积即为一般互联网使用的时长赋值( $M=44.20$ ,  $SD=23.34$ ,  $\alpha=.67$ )。

社交媒体。由于防火墙的存在和媒介管理政策的限制,中国网民无法访问facebook, tweeter等社交媒体。在中国,民众使用的社交媒体主要为微信、微博和

QQ等。本研究使用汤姆·贝克和克莱斯·德弗雷斯的互联网量表,对微信、微博和QQ分别进行测量,然后将微信、微博、QQ三种媒介使用的取值相加即为社交媒体的变量值( $M = 62.47$ ,  $SD = 47.49$ )。社交媒体的整体使用状况可参阅图1。

微信。对微信的使用测量主要通过两个问题以测定其使用时长,受访者要分别在一个李克特十级量表(1=0-15分钟,10=4小时以上)和李克特八级量表(从0到7天)中填写其使用时长:(1)您昨天使用微信多长时间?(2)您上周有多少天使用了微信?这两个项目的乘积即为微信使用时长( $M = 31.37$ ,  $SD = 25.00$ ,  $\alpha = .66$ )。

微博。对微博的使用测量通过两个问题,受访者要分别在一个李克特十级量表(同上,1=0-15分钟,10=4小时以上)和李克特八级量表(从0到7天)中填写其使用时长:(1)您昨天使用微博多长时间?(2)您上周有多少天使用了微博?这两个项目的乘积即为微博使用时长( $M = 15.94$ ,  $SD = 18.67$ ,  $\alpha = .70$ )。

QQ。对QQ的使用测量也通过两个问题,受访者要分别在一个李克特十级量表(同上,1=0-15分钟,10=4小时以上)和李克特八级量表(从0到7天)中填写其使用时长:(1)您昨天使用QQ多长时间?(2)您上周有多少天使用了QQ?这两个项目的乘积即为QQ使用时长( $M = 29.32$ ,  $SD = 26.47$ ,  $\alpha = .7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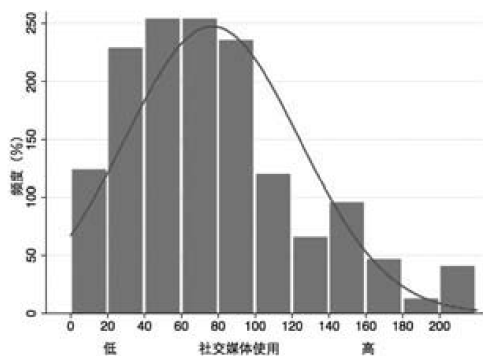


图1 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状况

网络规制。互联网规制的测量主要是依据受访者的自我报告,测量受访者对网络规制的心理感知,这种心理感知通常可以反映规制的严厉程度。本研究主要通过对网络实名制的法规管控、网络诽谤入刑的司法管控和网络删帖的行政管控三个部分测量互联网规制(每部分三个项目),受访者要在李克特五级量表中依次报告其在实行网络实名制以后、在该司法解释出台(规定虚假信息被转发500次可被判刑)以后和实行网络删帖制以后,他的下述行为发生变化的程度(共9个问题):

(1) 您在网上发布或转发时事信息；(2) 您在网上回复或评论政治帖子（或段子）；(3) 您在网上抗议政府的某事决策或行为（1-5分别为从明显增多到明显减少）。这9个项目相加的得分即为政府网络规制的赋值（ $M = 30.45$ ， $SD = 5.78$ ， $\alpha = .95$ ）。得分愈低说明网络规制愈宽松，得分愈高说明网络规制愈严厉。青年群体对网络规制的心理感知状况可参阅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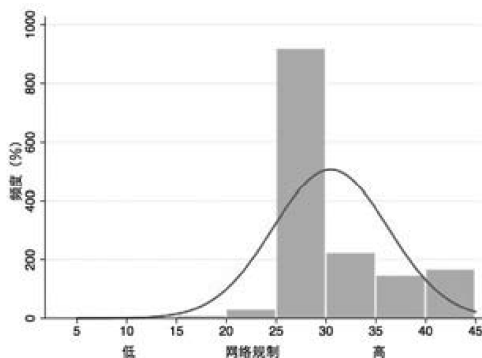


图2 青年对互联网规制的心理感知状况

### 3. 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政治社会化研究成果的变量设计，且为了防止设定误差（misspecification errors）的出现，本研究将人口统计学变量模块和政治前因变量模块（共8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人口统计学变量模块包含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四个变量。其中，年龄用开放式的问题直接测量（ $M = 21.50$ ， $SD = 2.28$ ），性别男女分别用1、0测量赋值（ $M = .43$ ， $SD = .50$ ）。由于本研究主要将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考察对象，所以受教育程度主要通过受访者报告自己就读的学历（本科=0，研究生及以上=1）进行测量（ $M = .15$ ， $SD = .36$ ）。经济收入用两个问题进行测量：（1）您家平均每月的收入有多少元人民币？（1=2千元以下；2=2千-5千；3=5千-1万；4=1万-1.5万；5=1.5万-2万；6=2-3万；7=3万元以上）（2）在当地，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属于哪一档？（1=远低于平均水平，5=远高于平均水平）两项合计的得分即为经济收入的值（ $M = 5.82$ ， $SD = 2.02$ ， $\alpha = .60$ ）。

政治前因（Political antecedents）变量模块包含政治面貌、政治兴趣、政治效能和政治倾向四个变量。其中，政治面貌用一个类别选择题进行测量（项目包括共青团员、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和群众），然后进行合并划分，将中共党员和团员分为一类，将非党团员分为另一类，分别赋值为1、0（ $M = .93$ ， $SD = .25$ ）。政治兴趣通过李克特五级量表询问受访者对“学而优则仕”和“政治很有趣”的赞同程度



（从坚决反对到完全同意）和“您对社会时事是否感兴趣”（1=根本没兴趣，5=非常感兴趣）进行测量，三项相加的得分为政治兴趣的赋值（ $M = 9.65$ ， $SD = 1.88$ ， $\alpha = .62$ ）。

政治效能的测量使用山本正弘（Masahiro Yamamoto）、马修酒辛奈（Matthew Kushin）（2015）和约翰·盖斯提尔（John Gastil）等人（2010）提出的成熟量表，通过受访者填写李克特五级量表（1=完全同意，5=坚决反对）进行测定，受访者需要填写他们对下述观点的赞成程度：（1）像我这样的人，对政府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2）政府的工作太复杂，像我这样的人很难明白。这两项相加即为政治效能的得分（ $M = 5.97$ ， $SD = 1.88$ ， $\alpha = .72$ ）。

政治倾向用五个问题测量，受访者要在李克特五级量表（1=非常赞成，5=坚决反对）中填写他们对下述观点的赞成程度：（1）党和政府应当决定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或观念在社会中传播；（2）党和政府应当决定国家所有事务；（3）观点多元会导致社会混乱；（4）支持党和政府就是爱国；（5）自由民主的普适价值并不适合中国。这五项相加即为政治倾向的赋值（ $M = 15.88$ ， $SD = 4.12$ ， $\alpha = .86$ ），得分越低说明越保守，得分越高说明越开放。

### （三）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嵌套式回归分析（nested regression）。为了防止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在带入回归方程之前，先将社交媒体使用、网络规制两个主效应变量进行对中化处理（Cohen, Cohen & West, et al., 2003: 261）。在回归模型中，首先将控制变量依次代入回归模型，然后将自变量代入回归模型，最后将交互变量代入回归模型。代入之前的贝塔值用于检验控制了前一层次变量时的交互效应（Hardy & Scheufele, 2005）。在本研究中，所有数据均是运用软件StataSE12.0进行分析和处理。

## 四、研究发现

H1包含两个子假设，它假设社交媒体使用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H1a）和线下政治参与（H1b）具有正面促进作用。回归方程显示（参看表3），线上政治参与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回归显著（ $p < .01$ ），作用方向为正向（ $\beta = .089$ ），子假设H1a得到了支持。这说明，社交媒体使用时间越长，青年群体的线上政治参与度就越高。在控制变量模块的基础上，主效应模块对线上政治参与因变量增加解释了1.46%的变差。类似于H1a，回归方程显示（参看表4），线下政治参与对社交媒体使用的也回归显著（ $p < .001$ ），社交媒体使用的作用方向为正向（ $\beta = .103$ ），子假设H2b得

到了支持。这表明, 社交媒体使用时间越长, 青年人群的线下政治参与度就越高。在控制变量模块的基础上, 自变量模块对线下政治参与因变量增加解释了1.52%的变差。

与社交媒体的正面影响不同, H2假设网络规制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H2a)和线下政治参与(H2b)具有削弱作用。回归方程显示(参看表3), 线上政治参与对网络规制的回归显著( $p < .05$ ), 作用方向为负( $\beta = -.055$ ), 子假设H2a得到了支持。这说明, 网络网络规制越严厉, 青年人群的线上政治参与度就越低。和H2a的情况类似, 回归方程显示(参看表4), 线下政治参与对网络规制的回归显著( $p < .05$ ), 作用方向为负( $\beta = -.055$ ), 假设H2b得到了支持。这说明, 网络规制越严厉, 青年人群的线下政治参与度就越低。

表3 社交媒体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影响的回归分析表

预测因素	线上政治参与				
	M1	M 2	M 3	M4	SE
年龄	-.016	-.028	-.023	-.023	.106
性别(男=1)	.098***	.091***	.091***	.091***	.422
教育程度(研究生及以上=1)	.024	.026	.033	.033	.663
经济收入	-.017	-.031	-.029	-.029	.103
R <sup>2</sup> (%)	1.05				
政治面貌(党团员=1)		-.019	-.018	-.018	.846
政治兴趣		.113***	.112***	.111***	.114
政治效能		.174***	.167***	.167***	.116
政治倾向		-.006	.007	.007	.054
R <sup>2</sup> (%)		5.07			
互联网使用			-.128***	-.129***	.011
社交媒体使用			.089**	.088**	.005
网络规制			-.055*	-.055*	.037
增量R <sup>2</sup> (%)			1.46		
网络规制×社交媒体使用				.011	.001
增量R <sup>2</sup> (%)				0.01	
总R <sup>2</sup> (%)				7.59	
调整 R <sup>2</sup> (%)				6.83	

注: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表格中的 $\beta$ 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对于网络规制的调节作用, H3假设网络规制调节了社交媒体使用与青年线上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回归方程显示(参看表3), 青年线上政治参与对交互项(网络规制×社交媒体使用)的回归不显著( $p > .05$ ), 作用方向为正向

( $\beta = .011$ )，假设3遭到拒绝。并且，调节变量模块对线上政治参与因变量仅增加解释了0.01%的变量。这说明，互联网规制的调节效应并不存在。

表4 社交媒体对青年线下政治参与影响的回归分析表

预测因素	线下政治参与				
	M1	M 2	M 3	M4	SE
年龄	-.034	-.042	-.037	-.034	.110
性别（男=1）	.086***	.073**	.075**	.077**	.438
教育程度（研究生及以上=1）	-.004	-.002	.003	.004	.689
经济收入	.004	-.012	-.012	-.011	.107
R <sup>2</sup> (%)	0.86				
政治面貌（党团员=1）		.014	.016	.014	.879
政治兴趣		.163***	.162***	.156***	.119
政治效能		.199***	.192***	.189***	.121
政治倾向		-.056*	-.045	-.050	.056
R <sup>2</sup> (%)		7.81			
互联网使用		.	-.126***	-.131***	.011
社交媒体使用			.103***	.097**	.005
网络规制			-.055*	-.056*	.038
增量R <sup>2</sup> (%)			1.52		
网络规制×社交媒体使用				-.068**	.001
增量R <sup>2</sup> (%)				0.45	
总R <sup>2</sup> (%)				10.64	
调整 R <sup>2</sup> (%)				9.90	

注：\*  $p < .05$ , \*\*  $p < .01$ , \*\*\* $p < .001$ ；表格中的 $\beta$ 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与H3的情况不同，回归方程显示（参看表4），线下政治参与对交互项（网络规制×社交媒体使用）的回归显著（ $p < .01$ ），作用方向为负向（ $\beta = -.068$ ），并且交互变量模块对线下政治参与因变量增加解释了0.45%的变差，调节作用明显，假设4得到了支持。这说明，网络规制和社交媒体使用对青年线下政治参与具有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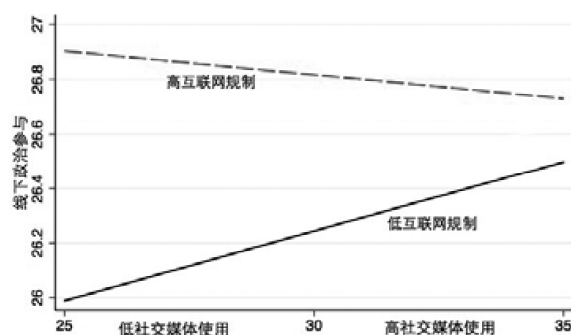


图3 社交媒体使用与网络规制的交互关系图

互削弱的作用，意即网络规制愈严厉，社交媒体对青年线下政治参与的影响就愈小；网络规制愈宽松，社交媒体对青年线下政治参与的影响就愈大。为进一步验证这种交互效应，本研究又做了简单斜率检验。简单斜率亦显示（如图3），互联网规制力度较低时（95% CI:  $-.054$  to  $-.020$ ），社交媒体对青年线下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比较显著；而互联网规制力度较高时（95% CI:  $.018$  to  $.084$ ），社交媒体对青年线下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则不显著。

另外，在控制变量模块中，性别变量对线上政治参与（ $\beta = .098$ ）和线下政治参与（ $\beta = .086$ ）均具有正面影响，且回归显著。这意味着与女性相比，男性青年的线上政治参与度和线下政治参与度都比较高。同时，线上政治参与对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变量的回归显著（ $p < .001$ ），作用方向均为正向。这表明青年群体的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感越高，其线上政治参与度就越高。与之类似，线下政治参与对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变量的回归也显著（ $p < .001$ ），作用方向均为正向。这同样意味着青年的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越高，其线下政治参与度就越高。值得注意的是，回归方程还显示，线上政治参与对一般的互联网使用、线下政治参与对一般的互联网使用的回归都显著（ $p < .01$ ），其作用方向与社交媒体的作用方向正好相反，均为负向（ $\beta$  值分别为 $-.128$ 、 $-.126$ ）。这意味着，网络使用时间愈长，青年人群的线上政治参与度和线下政治参与度就会愈低。年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经济收入和政治倾向五个变量则均无显著影响。人口统计学变量模块和政治前因变量模块对线上政治参与因变量分别解释了1.05%、5.07%的变差，对线下政治参与因变量分别解释了0.86%、7.81%的变差。

## 五、讨论与结论

继互联网之后，以微信、微博、QQ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在青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用户自生内容的新新媒介，社交媒体已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消息来源和新型参与平台，青年用户在信息分享、观点交流的即时互动中，自发自主地参与政治交流和公共决策。本文立足国内外社交媒体政治影响的研究框架和成果，对社交媒体对我国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进行了验证和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

首先，社交媒体对青年的线上政治参与和线下政治参与具有促进作用。这是对贾斯汀·巴塞克（Justine Pasek）、大卫·罗默（David Romer）（2009）和荷马·祖尼加（Homero Gil de Zúñiga）等人（2014）提出的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具有正面影响理论的验证和发展。巴塞克等人提出的这种理论基本上囿于西方民主社会，既未

分析该理论在东方威权社会的适用,又未观照对社交媒体的主要使用者青年群体的影响。由此,本研究将该理论置于中国,以青年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社交媒体对中国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的影响,最终发现:与一般网络使用的作用方向不同,社交媒体与青年的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是正相关关系。这表明,青年群体使用社交媒体越多,其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度就越高。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可能是社交媒体使用者可以自己制作内容、自主表达的便捷性既鼓励了青年群体,又提供了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活动的平台;原因之二可能在于社会媒体中基于熟人交际网络所产生的信任和安全感激发了青年参与政治的热情和效能;原因之三可能是社交媒体之上的多元信息的接触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唤醒、增强了青年的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青年群体在这种政治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中,隐性和显性的政治参与行为自然会增多。

其次,网络规制不仅对青年的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具有限制作用,而且还削弱了社交媒体对青年线下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互联网规制愈严厉,青年群体的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频度就愈低,社交媒体对青年线下政治参与的推动作用就愈小。这种治理效用虽然在实践中常常被媒介管理部门视为理所当然,认为网络规制举措推动网络空间日益晴朗有序,网络极化现象迅速减少,但是一直未有理论检验(张磊,2015:266-280)。本文即是对此进行经验性分析和验证。互联网规制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效用,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网络实名制的推行、网络诽谤入刑司法标准的出台、“微信十条”等各类规制措施的实行,强化了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对群体事件、游行集会的限制,对青年群体的线下非法参与和参与行为冲突产生了阻遏作用;(2)现行网络规制举措增加了青年网民信息获取和观点表达的成本,较为有效地减少了广大青年群体无序参与和失序参与的现象,限制了超越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需要的参与行为;(3)基于规避风险或获取政治资本的不同诉求,青年群体可能普遍会形成并强化自我审查的习惯,或选择少发布、不转发涉及特定主题的信息与评论,或选择戏谑化、娱乐化的表达参与方式,或选择远离政治、回避参与,普遍不会参与线上、特别是线下的集体行动(Roberts,2014)。即使参与政治,也多会选择成本与风险相对较低的线上政治参与,以“围观”介入的方式低度参与。

第三,网络规制对社交媒体的作用有限,它并未减弱社交媒体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影响。这说明,近年来我国所实施的网络治理举措虽然对社交媒体具有显著的规制效用,但并不是束缚和削弱了青年所有的政治参与行为,它只是限制了超越现有体制承受能力和冲击现行政治体系的线下参与行为。即网络规制的这种负向作用并不是魔弹式的强效果,而是一种有限的适度效果。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



三个：（1）社交媒体是用户自生内容的平台，尽管有网络规制，青年用户仍然有机会围观、表达与互动；（2）社交媒体是一种与现实人际交往圈子相交融的网络平台，基于对朋友、家人、同侪、趣缘等熟人社交网络的信任，青年群体仍然乐于分享和敢于表达；（3）网络规制力度的加大，虽然对青年群体的网络参与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实际上只是限制了超越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需要的参与行为，导致用户的表达趋于理性和成熟，青年人群逐步在法律范围之内传播信息、表达利益诉求。这与现有的研究发现基本类似，熊炎（2014）在对以“转发500次入刑”为标示的司法解释的管控效果进行研究后指出，该惩罚手段不是抑制谣言传播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它只是导致了仇官类谣言的数量比例和偏激程度显著下降。

第四，性别、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等人口社会统计学因素对青年群体的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均有一定影响。其中，相较于女性青年而言，男性青年群体的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度也较高。同时，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值得关注。研究数据显示，在中国，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愈高的青年人群，其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度也愈高。这与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比较类似，德国学者尤尔根·鲍克奈西特（Jürgen Bauknecht）（2012：86）在对德国和法国民众的政治参与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尽管在宏观层面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是在微观层面二者与政治参与具有正相关关系。”那么问题在于政治兴趣、政治效能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中有何具体作用？囿于文章主旨及篇幅，本研究对此未作分析。

此外，虽然这些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社交媒体在民主发展过程的作用，但是本文仍然存有一些不足。其一，本文将国外学者巴塞克、罗默和祖尼加等人提出的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影响的理论放置到中国进行验证和发展，尽管属于研究创新，但似乎对中西民主进程和意识形态差异化因素观照不够；其二，本文采用的是非概率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对全国大学生进行抽样，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抽样的误差、保证样本结构与总体的一致，但是只是从东中西部抽取了北京、上海、武汉和兰州四个城市，相对于全国655个城市的总量，覆盖率并不高；并且，调查对象主要是在校大学生，对其他社会青年群体、特别是农村未上大学的青年群体未能予以全面覆盖。研究样本不代表全国的大学生，结论也不可推广及全国的青年人群。其三，本文在发放调查问卷时，虽然考虑到了受访者的学科背景，专业范围涵盖了文理医工，但是调查问卷中却未设计相应的项目以测量受访者的专业背景，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后期的数据分析，致使本研究无法考察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联。其四，在分析社交媒体对政治参与的影

响时,本文未对微信、微博和QQ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且样本内部可能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尤其是忽视了“学校”变量,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文章对不同院校学生群体之间可能存在差异的探究,也制约了研究结论对样本的解释力。当然,这些不足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启发,未来可以对此进行修正、并做进一步探索。

(责任编辑:吴欣慰)

### 注释 [Notes]

1. 为了便于发放和回收问卷,学校和学院的抽取以方便为原则,优先抽取项目组熟悉的教师、学生和朋友所在的学校和学院。本研究样本所涉及的学校主要是北京、上海、武汉和兰州四个城市中的主要院校,在选取教育直属综合类院校的基础上,兼顾地方因素和其他因素。在北京抽取学校时考虑了地方因素,选取了北京市属院校北京工商大学,并选取了团中央直属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在上海抽取学校时,考虑了地方因素,选取了上海市属的(也是国家211工程)综合院校上海大学;在武汉抽取学校时,考虑了独立院校的因素,在学院选择时选取了武汉大学东湖学院(分校);在兰州抽取学校时,也考虑了地方因素,选取了当地省属院校西北师范大学,亦属师范类院校。在抽取的9所高校中,教育部直属综合类院校有5所,省属院校3所,中央直属院校1所。在27个学院中,文科类学院有14个,理工类学院10个,医学类学院2个,独立学院1个。
2. 样本中涉及的学院遍及文理医工,涉及的专业主要包括:会计、财务管理、市场营销、软件工程、机械工程、材料工程、测绘工程、导航工程、数学、物理、系统科学、临床医学、医学检验、地质学、教育技术、金融学、法学、投资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和文学等多个专业。
3. 对于政治效能的测量不论在国内和国外多采用反向编码,该量表最早源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于1952年设计出的一套关于政治效能感的量表,之后该量表通过严格的检验而得到政治学界的普遍认同,一直沿用至今。所以本研究直接采用了该量表,并未作较大改动。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陈力丹、谭思宇、宋佳益(2015)。社交媒体减弱政治参与——“沉默螺旋”假说的再研究。《编辑之友》,(05), 5-10。
- 方江山(2000)。《非制度政治参与——以转型期中国农民为对象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
- 教育部(2012年4月24日)。教育部批准的高等学校名单、新批准的学校名单。《教育部网站》,2014年10月20日检索于[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34/201205/135137.htm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34/201205/135137.html)。

- 究》，(08)，35-41。
- 马小娟(2011)。论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中国出版》，(24)，22-25。
- 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1976/1989)。《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韦路，李锦容(2012)。网络时代的知识生产与政治参与。《当代传播》，(04)，11-14。
- 吴世友，余慧阳，徐选国(2013)。国外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研究述评。《中国青年研究》，(07)，101-106。
- 王泰俐(2013)。“脸书选举”？2012年台湾总统大选社群媒体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东吴政治学报》(台北)，(01)，1-52。
- 熊炎(2014)。惩罚能抑制谣言传播吗？——以“转发超500次入刑”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02)，22-34。
- 徐凌蓓(2016年1月28日)。2016年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蓝媒汇》，2016年4月20日检索于<http://www.lanmeih.com/show/10000556>。
- 张磊(2015)。中国网络治理和公共舆情发展。载龚维斌(主编)，《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报告(2015)》(第266-28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4年7月22日)。2014年中国社交类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4年10月31日检索于<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bg/sqbg/201408/P020140822378154144978.pdf>。
-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8年3月5日)。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8年8月2日检索于[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bg/hlwtjbg/201803/t20180305\\_70249.htm](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bg/hlwtjbg/201803/t20180305_70249.htm)。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4)。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03)，9-10。
- Bakker, T. P. & Vreese, C. H.(2011). Good News for the Future? Young People, Internet Us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8(4): 451-470.
- Bauknecht, J.(2012). 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Gabriel, W. O., Keil, I. S., Eric Kerrouch (Ed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France and Germany*. Colchester: ECPR Press.
- Boulianne, S.(2009). Does Internet Use Affect Engagement? A Meta-Analysis of Research.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6(2):193-211.
- Campbell, S.W. & Kwak, N.(2010).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civic life: linking patterns of use to civic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0(3): 536-555.
- Carpenter, S. (2010). A study of content diversity in online citizen journalism and online newspaper articles. *New Media & Society*, 12(7): 1064-1084.
- Coleman, S. & Rowe, C.(2005). *Remixing Citizenship: Democracy and Young People's Use of the Internet*. London: Carnegie Young People Initiative.

- Cohen, J., Cohen, P. & West, S.G., et al.(2003). *Applied Multiple Regression/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3rd Ed.).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Delli Carpini, M. X.(2000). Gen.com: Youth, civic engagement, and the new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7(3): 341-349.
- DiMaggio, P. & Hargittai, E.(2001). Neuman, R. and Robinson, John, P.,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1): 307-336.
- Farrell, H.(2012).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Internet for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5(1): 35-52.
- Gastil, J. & Xenos, M.,(2010). Of attitudes and engagement: clarifying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c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0(2): 318-343.
- Gil de Zúñiga, H., Veenstra, A. & Vraga, E, et al.(2010). Digital democracy: reimagining pathways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7(1): 36-51.
- Gil de Zúñiga, H.(2012). Social media use for news and individuals’ social capital, civic engag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7(3): 319-336.
- Gil de Zúñiga, H., Copeland, L. & Bimber, Bruce(2014). Political consumerism: Civic engagement and the social media connection. *New Media & Society*, 16(3): 488-506.
- Hardy, B.W. & Scheufele, D.A.(2005). Examining differential gains from Internet use: compar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alk and online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5(1): 71-84.
- Hampton, K., Rainie, L., et al.(2014). Social Media and the “Spiral of Silence” . August 26, 2014, Retrieved from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4/08/26/social-media-and-the-spiral-of-silence/>, accessed 22 Apr. 2016.
- Kaufhold, K., Valenzuela, S. & Gil De Zúñiga, H.(2010). Citizen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How user-generated news use relates to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7(3/4): 515-529.
- Kushin, M. J. & Yamamoto, M.(2010). Did social media really matter?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media and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in the 2008 electio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3(5): 608-630.
- King, G., Pan, J. & Roberts, M. (2013).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2): 326-343.
- Lorentzen, P.(2014). China’ s Strategic Censor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8(2): 402-414.
- Nisbet, M. C. & Scheufele, D. A.(2004). Political talk as a catalyst for online citizenship.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1(4): 877-896.
- Norris, P.(2000). *A Virtuous Cycl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Östman, J.(2012). Information, expression, participation: How involvement in user-generated content relates

- to democratic engagement among young people. *New Media & Society*, 14(6):1004-1021.
- Postmes, T. & Brunsting, S.(2002).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Age of Internet: Mass communication and online mobilization.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0(3): 290-301.
- Putnam, R. D.(1995).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4): 664-683.
- Pasek, J., More, E. & Romer, D.(2009). Realizing the social Internet?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meets offline civic engagement.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6(3/4): 197-215.
- Quintelier, E. & Vissers, S.(2008). The effect of Internet use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 analysis of survey results for 16-year-olds in Belgium.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6(4): 411-427.
- Roberts, M. E.(2014). Fear or Friction? How Censorship Slows the Spread of Information in the Digital Age(Unpublished manuscript). *Scholar at Harvard*, August 13, 2014, Retrieved from [http://scholar.harvard.edu/files/mroberts/files/fearfriction\\_0.pdf](http://scholar.harvard.edu/files/mroberts/files/fearfriction_0.pdf), accessed 26 Sept. 2015.
- Shao, G. S., Lu, J. Y. & Wu, J. N.(2012). New Media & Civic Engagement in China: The Case of Xiamen PX Event. *China Media Research*, 8(2): 76-82.
- Savigny, H.(2002). Public Opinion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Internet. *Politics*, 22(1): 1-8.
- Shah, D. V., Rojas, H., & Cho, J.(2009). Media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On understanding and misunderstanding communication effects. In Bryant, J. & M. B. Oliver (Eds.), *Media effec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Routledge.
- Verba, S., Schlozman, K. L. & Brady, H.(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alenzuela, S., Park, N. & Kee, F.(2009). Is There Social Capital in a Social Network Site?: Facebook Use and College Students' Life Satisfaction, Trust,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4(4): 875-901.
- Vitak, J., Zube P., Smock A., et al.(2011). It' s complicated: Facebook us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2008 election.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4(3): 107-114.
- Weber, L. M., Loumakis, A., & Bergman, J.(2003). Who participates and why?: An analysis of citizens on the Internet and the mass public.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1(1): 26-42.
- Yamamoto, M., Kushin, M. & Dalisay, Francis(2015). Social media and mobiles as political mobilization forces for young adults: Examin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online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New Media & Society*, 17(6): 880-898.
- Zhang, W., Johnson, T. J., Seltzer, T. & Bichard, S. L.(2010). The revolution will be networke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on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8(1):75-92.